

# 研究社會語言學，迎接劃時代的挑戰

楊秀玲\*

## 引言

在進入1999年和二十一世紀的倒數日子裏，澳門的語言教學與研究，是擺在我們面前最有意義的任務之一。社會的急劇變革和劃時代的挑戰預報着新千年的來臨。用不着八年時光，我們這幸運的一代，就將迎來“千福年”。本文將先闡述一下澳門錯綜複雜的社會語言環境，然後平眺有着共同命運的香港、息息相關的珠江三角洲和經濟騰飛的台灣，再移目望向東南亞、亞太地區，以至放眼全世界。東西方交流的成果，為我們在歐洲和世界各地開僻新的天地、建立新的關係和帶來新的希望。從政治、經濟、文化、貿易諸關係的建立、維繫和發展，都意味着澳門多語的需要，並反過來促進多語方向的發展。

澳門有着得天獨厚的國際地位，將來隨着幾項全球意義的巨大工程上馬，這特殊地位又會進一步提高，那些帶着人文主義的主題、理想和抱負的工程項目，將更使澳門面向全球。社會的進步和未來的發展，除了需要有傑出的社會精英外，還將要有多語的優秀人材。可惜的是，我們這個多語的小城，迄今未見對其語言現象展開系統的深入研究；對語言教師的專業培訓也才剛剛起步。“其實，往往要通過對雙語和多語的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才能真正領悟到語言的社會意義。也就是通過這一類研究，才會發現在哪些方面語言的變化，會反映社會文化的價值觀。”（普來德，1979）因此，本文將用相當的篇幅，強調要對多語的、熔滙了東西方文化的澳門，進行系統的研究，提出幾個重要的研究領域。同時也將探討一下語言教師的培訓，提出如何利用澳門的特有優勢，加快多語人材的培養。

---

本文為作者於“澳門過渡期語言發展路向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之發言，該研討會由澳門社會科學學會主辦，於一九九二年三月廿八日至卅一日舉行。

\*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

澳門的語言問題提出很久了，早就該提到議程上來了。語言問題是關係到澳門前途的關鍵問題之一，而在這過渡期的歷史關頭，顯得愈加突出和迫切。正是這種“緊迫感”，促使我們嘗試研究澳門的社會語言現象及其與語言教學的關係。語言教學從來都是與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緊密關聯着的。只有堅持刻苦鑽研，認真系統的教學，對教學法諸流派的理論和方法作深入研究和檢驗，博採衆長，學以致用，不斷創新，才能提高澳門的語言教學質素，以迎接劃時代的挑戰。

在研究方法方面，粗略地說，是由社會語言學的宏觀研究到微觀研究；重點則從語言的社會因素到語言習得的個人因素。

## 澳門的社會語言環境

葡國科英布拉大學經濟系教授兼社會研究所主任蘇保榮教授曾對現今澳門社會做了這樣的描述：“澳門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微型世界，是一個十分特別的葡國老殖民地，又是一個多種文化、多種語言的社會。她將好幾個多元化——文化的多元化、社會政治的多元化、語言多元化、法律多元化——共治於一爐。”蘇保榮教授和他的助手、法律專家高美利博士，曾在澳門進行過兩年長的、深入的社會調查，寫出的報告書長達千頁，對澳門的社會問題、特別是法律問題，進行過科學的分析，提出了較客觀的見解，由西方社會科學家做的這一類社會調查，在澳門還是首次。經過詳述的論証後，他在提出當前的任務及其指導原則的結語中精辟地說：“澳門在文化諸方面已是一個高度多元化的社會，這一點應繼續保持。我們發現澳門的種種多元化，非常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既有中國文化華南地區的風貌和習俗，又有獨特色彩的澳門文化、葡萄牙行政管理文化和香港經濟文化等，因此，澳門的獨特地位絕非抽象概念，澳門的特色體現在其文化、法律和社會多元化之中；同時也體現在居民生活質素、園藝、建築、飲食及其國際都會的眼光和觀貌之中。”

其實，種種多元化已使澳門成爲獨特的“博物館式的城市”。（魏美昌，1991年）這座城市博物館，真實地展示着四個半世紀東西方文明交流的歷史、人口的變遷和自從“海上絲綢之路”開拓以來的經濟發展史。僅根據1991年的人口普查，只有17平方公里的澳門，擁有四十萬一千八百人口，既有老居民，也有相當大比例的新移民；既有中國人，也有不可忽視的土生葡人；不僅有豐富的中葡文化遺產，而且中葡英這三種語言同時交替使用。廣州話和葡萄牙語不用說了，英語在金融、貿易、旅遊、娛樂博彩、教育以及國際交往中的使用，更佔絕對優勢，還往往成爲操各種不同語言的人相互溝通的中介語。中葡人士之間，官方或私人，也常常應用英語來溝通的，一些難度較大、內容較複雜的文件和文藝作品，亦常見以英文作爲中葡文的過渡媒介。隨手可摘的一個實例，就是目前正匆忙地想把澳葡法律，趕在1999年之前譯成中文。由於工程浩大，有學者建議分兩步走，即先由葡文譯成英文，再由英文轉譯成中文。其實談何容易啊！當我跟一位法律專家談論此事時，她慷慨舒嘯，又像臨清流而賦詩！她說：“

難道學者們不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嗎？難道他們真的以為可有足夠的人力、物力、專業知識和技能，來對付這三種截然不同的語言。三種截然不同的法律制度嗎？我的天啊，中葡法律，天淵之別，簡直沒法比較，就像美人魚跟恐龍……”。不管此比喻是多麼的古怪，我這位朋友情懇意切地提出忠告：光看今日在香港，已足夠我們借鑑。根據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梁冰濂的看法，香港政府想把全部法律準確地譯成中文，是“太艱巨了，是幾乎難以實現的……。問題是你別指望把普通法的有效判例全譯出來，也很難用中文說明普通法系統，因為它並非整套法典。”（南華早報：大律師公會對香港法律的翻譯提出質疑。1992年3月2日）據知，香港政府極欲將法律譯成中文，從1987年迄今四年多來，花了大量人力物力，但那兩萬多頁的條款，只譯完百分之十。中譯文的初稿還備抨擊；“叫人沒法看懂，簡直不是中文。”（南華早報，同上）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屬於羅馬日爾曼體系的葡萄牙大陸法會更複雜，整個翻譯工程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相當艱巨的。

有趣的是，我們一面全力支持中文的合法地位和多使用中文，一面我們又同情那維護葡語和文化的呼聲！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儘管葡國管治澳門四百五十年，葡語的使用，從來只局限於官方和政府部門，其普及遠遠比不上英語。葡語的使用逐漸減少，由英語取而代之是完全有可能的。為了保持澳門的特色，就要保護葡語和文化；不僅只作為文化遺產陳列在博物館裏，還應讓它在行政、立法和司法方面，真正扮演其應上演的角色。

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約佔澳門人口百分之二的土生葡人，會聽會說廣州話，但多不會讀和寫中文。他們有着特殊的社會地位，扮演着特殊的管治角色。作為中層公務員，“他們從來就是澳葡當局行政高層和華人社團之間的天然橋樑。”（魏美昌，1991年）另一方面，在協助蘇保榮教授作社會調查的採訪翻譯過程中，我接觸過不少普通公務員，有從事園藝的，有做維修工作的，他們也能說不少零星的葡語，但不會讀和寫葡文。這在某種意義上“文盲”，居然可以跟葡國教授溝通無阻，實在令人讚嘆。更妙的是，他們最常用的葡語詞匯是“家”、“朋友”、“錢”等，使人立刻想到澳門語言運用的三個領域：家庭、學校和職業。

其實，人們都會留意到，在澳門這微型天地裏，除了中葡英三語流通外，來自世界各地的成千上萬的遊客，川流不息地進入澳境，說的是多國語言；人們也會看到，澳門居留着五萬歸僑，他們在不同的場合，應用祖籍方言、不同口音的“普通話”，甚至繼續使用原僑居地的語言——印尼語、緬甸語、等等。有時也會幾種語言混合使用和交替使用。只要你到鬧市走動走動，聆聽聆聽，你定會發現，小小的澳門，竟是個語言的大匯點！

誠然，在這種環境下，多語的互相影響和滲透、語界的模糊和語言的混雜使用就在所難免了。在每一種語言的習得過程中，要學到純正的語言並達到高水準，就要盡更大的努力了。語言教師、學者和教育學家對越來越泛濫的非規範語言的混雜使用同表關注。特別是在學生的寫作方面，當學生隨心所欲地將支離破碎的英文，胡亂地穿插進中文作文裏，使教師深感頭痛。語言的“環保分子”阻擋

不住語言的“衰敗”，難以捍衛語言的“純潔”。語言學家程祥徽教授和劉羨冰校長在其合寫的論文《澳門的三語流通和中文的健康發展》中，列舉了大量生動有趣的例子，說明在多語的澳門，多種語言在相互影響和滲透。他們對Chinglish作了尖銳的批評，稱之為“夾雜英文詞語的不純正的漢語”，甚至稱之為“怪胎”。

但是，不管怎樣，這種語言現象會繼續存在。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這特定的語言環境，為語言研究提供了有利條件。從積極方面來看，澳門是英雄用武之地，是從事語言教學生動活潑的研習場，更是語言學家和社會學家從事語言教學法研究、特別是社會語言學研究的理想園地。

## 澳門語言教學的現狀

上面提到，澳門尚未形成自己一套完整的教育制度。雖然政府已邁出了一大步，而且制定出《教育綱要法》和《高等教育法》，但很關鍵的語言問題，尚未提到教育委員會的議事日程上。而說到語言教學又有它一整套的體系：政策的制定目標、行政管理、專業原則、教學形式、師資培訓、教學法、課程設計、教材編寫、語言教學成就的限制條件以及評核等，都是要一步步解決的問題，可能要花好多年才會有所成的。其實澳門學校制度的多元化是最明顯不過的了：有的取決於傳統的附屬關係，有的根據學生的升學取向，還取決於授課的語言。例如，準備學生升讀台灣的大學的學校，當然採用台灣的學制；而準備學生升讀香港的大學的，就跟隨香港的學制，但主要還是取決於授課語言。每間學校根據其傳統、特色，學生的需要和出路，師資和資源來決定其教學語言。據此，我們大致上可把澳門的學校分成四種：以中文為授課語言的中文學校，以英文為授課語言的英文學校，以葡文為主的葡文學校，還有雙語（中葡）學校。根據最近政府公佈的統計數字，1991—92年度，有137間（中小學分開計）中文學校，擁有七萬學生，佔全澳學生的83%；16間英文學校約七千學生，佔全澳學生的9%，而其餘學校有學生三千二百九十七人。從數字顯示出，澳門四十萬人口中，有八萬名學生，即是說，每五個澳門人，就有一個是中小學生。但更突出的是，在澳門所有學校都同時設中英葡三門語言課（亦有學校開設法語課），而除中英必修之外，葡文也是必然的選科。三種語言中，葡文是“寵兒”，享有政府的資助，配有良好的師資和設備。

近年來政府極力推廣葡語教學，祈求在1999年之前的最後幾年，畢其功於一役。兩三年前，許多中外學者認為政府的努力是徒勞的。理由很簡單：怎可指望用幾年的時間，來成就過往幾百年沒能成就的大業呢？不過現在看來，有時某種刺激，也會觸發奇跡出現的。在葡文班裏，教師派發問卷，其中有一條問為什麼要學葡文？不少人坦白地答：“我想多賺錢”。公務員獲得的雙語津貼該是一種有效的鼓勵。有些政府部門規定，政府官員要學中文或葡文以成為雙語人材。有些政府部門星期一至六，每天上午九時至十時用來學語言。辦公室成了語言課室。政府部門也為華人開葡文班，為葡人設中文班。夜學葡文班常擠滿了護士、醫生、教師、警員及各專業人士。上班前上課，午間工休上課，晚飯前、晚飯

後上課，澳門人如此拼搏學外語是前所未有的。行政暨公職司開辦過一期語言教師進修課，二十個學額竟有上百人申請。每晚八時至十時上課，竟無一人請假或缺席。

其實，澳門回歸中國，並不等於葡語和葡國文化也要撤回歐洲。語言學習可以超越國家民族的界限。通曉中葡雙語，有利於促進國家民族的交往，有利於保持和豐富澳門的文化遺產，傳之於後世。這種情感的抒發，請看文化學會的一首詩：

澳門是一文化巨著！  
砌磚添瓦、修橋鋪路，  
中葡人民齊來建築；  
作家給它描述，詩人賦它靈魂，  
一章接着一章，  
一部接着一部，  
馬交在書中屹立如故！

（譯自1987年10月15日香港英文虎報）

澳門傳播旅遊暨文化政務司高樹維最近宣稱澳門為“世界文化城”。（南華早報1992年3月30日）澳門東亞大學的成立和發展為今天的澳門大學，在學術各領域擔負起科研和教學的主導地位，這裏面也包括了語言的教學與研究。

## 促進澳門發展，加強國際聯繫

澳門跟香港，後者稱為“東方之珠”，前者號曰“東方蒙地卡羅”，近百年來，經歷過巨大的沖擊和變革，有着近似的命運，同享亞太地區經濟發展的果實，人均產值在亞洲僅次於日本，汶萊和新加坡。一切利好因素幸運地套在一起，使港澳保持繁榮和安定。政治上，港澳將分別在97年和99年回歸中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同時港澳又是中國的兩個前哨“窗口”，為中國提供世界信息、引進外資，吸取現代科技和工商管理經驗。港澳又是東西方文化的交匯點。

在過渡期裏，港澳面臨相同的問題和挑戰，包括語言方面。澳門傳播旅遊暨文化政務司高樹維在他最近訪港時也說到這一點：“……澳門和香港一定要在政治和經濟上緊密合作，不論官方的還是民間的，這種關係要進一步加強。我們在過渡期面臨的問題大致相同：有公務員本地化的敏感問題，法律問題，跟中國人打交道的問題，還有語言問題。”（南華早報1992年3月10日）

誠然，港澳之間在人口、面積、經濟實力、國際地位和教育方面的差別，也是顯而易見的。單看語言問題，香港政府教育委員會五次報告書都把它當重點問題討論。由於種種質與量的差別，香港對澳門各生活領域有絕對的影響。澳門人在許多方面都跟香港認同。以電視為例，百分之一百澳門觀眾看香港電視。傳媒

對男女老幼的影響是深刻的，這裏也包括了對人們的語言習慣和語言發展的影響。連牙牙學語的幼兒，話還不會說，就跟着電視唱廣告歌，邊唱邊吸收其香港文化、價值觀和語言成份。

除了跟香港的關係之外，澳門與珠江三角洲、台灣、亞太地區、歐共體等，建立並發展關係。而所有這些關係的建立和發展，當然離不開語言的關鍵作用。

澳門雖小，却有着獨特的吸引力以及促進國際交往的活動力。澳門一年四季節慶不斷，定期舉辦的大型國際活動，引來國際一流的藝術家、音樂家、賽車手。光1991年就有第三屆國際烟花節、第五屆國際藝術節、第三十八屆格蘭披士大賽車、言語、烟花、旋律、車聲交織在一起。而1992年是一連串的國際會議、學術研討會，研究討論財政金融、工商貿易、旅遊、投資、歐共體以及雙語、多語的發展等。澳門五星級酒店的密度也是世界第一的，可為國際學術活動提供理想的會場。因此，九十年代的澳門，不僅繼續吸引遊客、商人、還會吸引世界各地的投資者、行政管理人員和專家學者。

此外，一些大型建設，將進一步提高澳門的國際地位。這包括國際機場、新碼頭、深水港、貨櫃碼頭、第二條澳氹大橋以及廣珠鐵路。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希望與幸運”巨塑，據知已經籌劃八年了。其人文主義的主題，靈感來自紀念法國大革命一百周年的艾菲爾鐵塔和紀念美國獨立一百周年的自由女神塑像，並緊抓着這新世紀，新千年蒞臨的歷史機緣，在東半球建立一巨塑。以象徵世界和平和人類希望，並祈求為澳門帶來繁榮昌盛。所有這一切，都給澳門的語言教學提出新挑戰和令人興奮的前景。

## 師資培訓與研究

然而，當我們一面對澳門語言教學的現實，就看到一大堆問題。例如除了方言外，學生要應付三種語言。他們到底學得怎樣？幾種語言怎樣分辨或混淆到何種程度？均尚未見深入細緻的研究。在學校裏的各科語文教師，像在打一場語言爭奪戰——爭奪學生的時間和精力。因缺乏統籌和管理，混亂、重疊，教師負擔過重，使教學盲目而沉悶，教學質量沒有保證，程度差距太大。特別是學生母語都未學好，缺乏第一語言的基礎，同時又要應付三種不同語言，結果哪一種都難學好，也影響別的科目知識的吸收，是應作深刻檢討的。

不用說、語言教學質量取決於教師的質量，而師資培訓計劃要靠科研成果提供準確的資料和依據。可是，科研却恰恰是澳門最薄弱的環節之一。當然，澳門大學的發展和逐漸完善，將使情況有所改善。大學的主要任務是教學和科研，兩者相輔相成。沒有科研，學術界就會死氣沉沉，沒有創新，而教學和專業也得不到健康的發展。重大的科研項目，包括語言研究和政策的制定，該由政府部門與大學共同參與。下面幾個方面的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最迫切的計為：

1. 徹底了解我們多語言環境形成的文化、歷史、政治和經濟因素，以明確未來的語言需要，制定相應的語言政策，以迎接劃時代的挑戰；

2. 認真調查語言運用的不同領域，以便認識語言的地位、語言的選擇，從而提出教學的目標和要求；
3. 全面研究澳門的學校類型、教學媒介、學生發展方向以及學校的歸屬關係，從而為澳門學校的語言教學計劃協調和系統化，提供理論根據和指導；
4. 深入研究教學效果和回報率，特別是澳門學生從幼兒時已開始第二語言的學習，一學十數載，但收效與所花的時間和資源極不相稱。這該從教學的每一個環節進行檢查，找出癥結的所在，提出積極的解決辦法；
5. 對現有的教學輔助設備進行認真的研究和評估，避免盲目的一窩蜂地鑽進昂貴的硬件中去，浪費已夠緊張的資源。對語言實驗室、電腦輔助教學要耐心實驗和研究，以探索出最佳效果；
6. 全面、深入研究語言教學法、教學理論、社會語言學諸領域，從而找出在多語環境下的教學規律，鼓勵語言教學的創新；
7. 認真研究語言本身的規律，人類語言的共性以及與第二語言習得的關係。

此外，對澳門的現有語言教師隊伍也應進行調查。其實澳門有着一支很具國際性的教師隊伍。單英語教師隊伍，除了本地培養的之外，就有來自香港、中國、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印度、緬甸、印尼、美國、英國、加拿大，甚至還有來自中東國家和非洲的烏干達。研究這些教師，把他們的故事寫下來，可出一本大部頭的書了。當然，學校校長和教育學家對這樣一支語言教師隊伍，會有不同的看法，也會由於他們語言的差異，專業水平的高下以及文化背景的不同，造成管理和溝通上的困難。不過從積極方面來看，應是利大於弊。特別是考慮到澳門師資短缺，未來的需求，以及澳門本身多語、多種族的特點，這樣的教師隊伍是有好處的，是可以通過在職培訓和精心設計的培訓課程予以充實提高的，不僅提高其專業質素，更可增強他們的歸屬感。這樣做的成功機會，應該是比較大的，因為他們就在我們中間，擔負着語言教學工作，逐漸溶入澳門社會，為教育事業做出貢獻。

最後，我想重申：本文只是對澳門社會語言現象進行初步探討，旨在提出問題，引起研究興趣。我深感到，有太多的問題需要研究和解決。千頭萬緒，非本人能力之所及。我衷心希望，語言專家、語言教師和教育界先進和朋友們充份認識到我們面臨劃時代的挑戰和擔負的使命，展開深入研究，為迎接新世紀、新千年，為澳門的繁榮培養多語人材，做出卓越的貢獻！

